

## 本期话题:

文本选读——  
2015期刊扫描

十月

□李蔚超

2015年的《十月》杂志目录上仍然充满着新鲜的作者名字,寻找,发现新作者是几年来这本文学刊物始终坚持的路径。推介新作者实为其表,细察《十月》刊发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贯穿暗含着编者和作家们对今天中国人关注的新问题尚未被文学发现的新人物的探索,对于经久不衰的“城乡”、“日常生活”的主题,则力求寻找新颖的表达,近年来《十月》并不刻意地推出了“现象”型、“话题”性的作品,毁誉参半也好,众说纷纭也罢,它使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文学期刊仍然保持着严肃思考和迅速回应现实的活力和实践力。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无疑回应了文学界对青年一代作家“直面和书写”时代焦虑的呼唤,也是关于近年来文学界乃至社会大众的热议话题和重要主题“青年一代命运”的表达。三位北大毕业生的命运和抉择故事结构并不复杂,秉持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石一枫长于塑造人物,小说中的三个北大人富有广泛的代表性:安小男代表出身寒素的大学生,他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技术能力,却执著于道德和理想,绝不苟同于物质主义原则;李牧光是“拼多多资本主义”的富二代,精明、某种程度上地好义乐施,熟稔资本法则;叙事人“我”则是犬儒而迷惘的“大多数”的代表。随着小说的进展,三种阶层出身、三种价值观的北大命运沉浮变迁和互相影响,安小男安贫乐道的人生结局和“我”对他的同情和认同,是作家对青年理想、追求和时代关系的价值判断。小说跨越了“中国”故事之界限,地球之眼既是隐喻——至高无上的道德审判的大他者,也是切实存在于互联网、全球资本与现代交通的真实境况,石一枫巨大的吞吐时代信息的能力令人惊喜。

本年度《十月》新开辟的“思想者说”栏目“旨在召唤文学与当代思想对话的能力,记录当代人的思想境遇与情感结构”,李零的《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与他近些年研究一样,没有经学家的虚谈,没有空谈心性,没有琐碎无用的考据,乃是经世之学。李零从文化背景、学术方法、工作语言和研究方法几个方面细察细究法国学、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其中差异,指出更为“实实在在的不同”——观察角度、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学科的不同名称背后包含的是地缘政治与自我文化想象的大问题。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是富有话题性的文本。杨庆祥具有敏锐洞察、勇气反抗周遭不平不义不正的“精英意识”,他也开启了2015关于青年人命运话题的热议潮流。代际视野的理论框架近十几年来被充分使用在文学批评之中,然而文学世界或曰话语实践与生活世界毕竟不是同质同构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向之后,犬儒心态与历史虚无主义等文化现象并不独属于某一代人,这些现象结构性地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戴锦华称之为“历史的坍塌与扁平化”,“大时代”与“小时代”表意和体验差异之下牵连的是城乡差异、资本全球化、资源积累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群己人我之间,在物证与心证中,今天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经验、实践和理论的碰撞中触摸这些问题,尚需要更具有阐释力的言说方式。

城乡是为二元,兼具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城中有乡,城市中的过客、异乡人的无枝可依之感,大抵源自心中故土的召唤。乡中有城,远方的繁华都市隐隐地诱惑着乡土大地上的人们。留守、进城、回乡,构成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结构,从鲁迅的《故乡》开始,这一结构一用就用了近百年。然而,留守守的是什么,归去来兮的见闻和冲击是什么,流转迁徙的故事中包含着考察不同时代作家的标尺。罗伟章的《声音史》笔力诡谲地创造了一个留守的乡村异人,耳力惊人而善于模仿万物声响,以声音志“史”,以志乡村倾颓之史,然而,异人杨浪的口技记录下来的是破碎的乡村记忆,穷困、饥饿、无性、暴力,那些乡土中国内蕴的、原初的、具体的、鲜活的,只要从中习得了溶于日常生活伦理的情义和智慧,哪怕不识字的人也会知情达理的传统,几乎荡然无存。如果在今天吹奏乡村挽歌,我们可能需要比倾颓的记忆更多更深刻的呈现。钟求是的《找北京》看似一个外省的村里人来首都艰难走一遭的进城故事,然而这篇微凉而忧伤的小说并不这样简单,小镇上的母亲远娘带着弱智痴愚的女儿远巧过着辛苦而平常的日子,情感未泯的远巧爱上了电视上的“觉新”,于是,召唤她们前去首都北京的是一个痴女痴恋的荧幕虚拟人物。这是一种超越理性和逻辑的执念,无法遏制也必然无望,许多人对城市的迷、幻、执也是一种痴女痴恋,远娘和远巧毫不留恋首善之地的繁华热闹——实际上,她们“找上”北京,也仅是在胡同中过着小镇似的生活,她们对城市缺少探索和融入的兴趣和能力,然而作者颇具匠心地留下了与远巧相伴多年的母猫“小花”,小花走失在北京,乡镇与城市的暧昧纠葛并未也不会斩断。小昌的《小河天》是回乡者的故事,“我”是并不带有城市“文明”、“现代”评判标准的叙述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无力的审判者,却被美丽的女孩“丹丹”寄托了救赎的愿望,孱弱无能的“我”呈现着离乡进城者的某一种境遇,一种在城与乡之间的双重错位和失败感。

阅读2015年度《十月》刊发的小说,作家更倾向于寻找生活世界中的断裂、爆发、病症、变异性情节“抵抗”生活之庸常。然而,现代人已逐渐进入一种“生活世界”。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普通人看似自生自灭、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实有一种坚忍的力量在支撑,寻找到这种力量,普通人文安身立命与自觉建构主体性的意义,在文学中以描述性的表达来指认这种力量,也是体认并呈现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的努力,生活并不是自在自为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作品以“知”体察生活“不知”的莫可之名。

## 《人民文学》:文学维度与生长焦虑

□赵 依

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过去的文学嫡系随之聚散重组,面目尚且模糊的新浪潮及其在虚构与非虚构中拉扯出的精神张力正指向某种深刻的裂变可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此之谓也。在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以及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纷纷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人民文学》作为旗帜性文学刊物在2015年步履沉重,它以一种博大而敏感的微妙来践行承担的勇气与精微,它在任何时刻都具备转身的开放性,又在任何转身的瞬间都无比谨慎,尽管这为读者带来了些许辨识上的茫然与混沌,但此番成熟稳重所持的徘徊犹豫到底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一点“慢”特质,而对时代的敏锐自觉以及对现实的向上超越共同形塑了《人民文学》在2015年的文学维度。

基于内质的多变与复杂,这个维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被虚线框起的不稳定区域,而面对当下的文学发展现实,这种维度的选择及其构建的机制似乎是《人民文学》几经思虑后得出的最佳方案。这一年,包括“海外女作家作品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选作品”以及“新浪潮”栏目,《人民文学》共刊发短篇小说30篇,中篇小说23篇,长篇小说7篇,另有“微篇小说辑”和“科幻小说辑”,小说创作群的更新与延伸依然是《人民文学》在整体上呈现文学样本丰富性的重要表征。《人民文学》曾于2009年第12期推出“新海外作家专号”,时隔6年再推出“海外女作家作品辑”,作家的创作在情节与人物、结构与视域、经验与情感以及思想等方面均呈现出传承现代文学精神谱系与文学传统以外的新内核,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经验

之现代叙述的全球化视角,同时亦呈现出海外华语文学写作的新标识。微篇小说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我国古代的《论语》《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经典文本中就有实践,《人民文学》2015年第5期以微篇小说文体为特辑,正式昭告了更“短”、“更简”、“碎片化”、“即时性”和文学“信息化”等诸多不能被主流文学和传统小说的延长线所辐射的时代新口味。第7期的“科幻小说辑”精选三位科幻小说青年名家的新作,科幻文学的突起实际意味着宇宙时空意识和生命本质观照在中国文学的复合生成,正如该期卷首所言:“个人——别人——人类的生活,这也许正预示着今天文学的审美观照与精神关怀,渐趋张大的情势。”此外,《人民文学》在既有的传统小说、诗歌、散文基础建制上,继续加强了“非虚构”和“新浪潮”的文学新生力军建设,形成了向下扎根现实、向上探索超越、向外追寻时代、向内沉淀自我的独特风貌,尽管分裂纠结,但多重文学形态的交错冲撞确也形成思考的助力——它们充盈《人民文学》,也如映射出文学光怪恢弘的发展现实与生产规则。

可喜的是,在基本生活需求可以轻易得到满足的和平年代,作家得以心怀诗意图与远方,发现那些一度要失落的因子,并由此生发新意。在刚刚揭晓的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刊发于《人民文学》的上榜作品共4篇: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刘建东《阅读与欣赏》、阿来《三只虫草》、麦家《日本佬》。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通过故事中的故事——《战事信札》,真诚呈现了那一批为民族、国家而战的年轻人的形象。如今的中国人已得偿所愿,得以在非战争、非灾害、非政治化的社

会语境下开启自我的现代选择,信札既是战事详叙,更是情书长卷,艰苦与浪漫、危难与向往饱和其中,从而在某种层面上回应了现代生活与时代精神对文学母题提出的超越性期待。阿来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亦是如此,小说以藏族少年桑吉的个体选择诠释时代巨变,叩问中国人普遍面临的精神性困局,我们如何在灵魂与肉体的错落中安身立命?在2015年的《人民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与现格局和时代气象相适的文学创作生态,整体上的丰富与均衡得益于作家个体的实现,作家们纷纷拒斥在简单化的描述与判断中享受控制的权威,他们逐渐走向平和,不再急于得出结论,他们悄然放缓笔触,在情感与理性的双重介入中关怀现实费心打造的各处弯弯曲绕。无论是反思物质主义还是探寻精神本源,描摹乡村图景、现代转型抑或新媒体时代,《人民文学》2015年刊发的各题材小说中,不乏一批在叙述上适度放弃全知视域,在表达上以向内对冲向外,同时在价值趋向上展示现代人性的新作品。

2015年,《人民文学》实现了自觉于时代且超越于现实的文学维度,而这将在2016年引发新的生长焦虑。因为文学总是围绕某种真实展开,在“自觉”与“超越”各自对应的策略与伦理之下,这种维度本身即是最大的挑战。各类文体的真实观何以确立?逻辑支撑的起点究竟为何?那些经由文字抵达的殊途同归,是否能在生活的复杂之外给人以清朗的力量与希望?太阳发光是自体需要,照耀别人是衍生功能。如果说作家作品是太阳,文学刊物便是使其照耀功能最大化的采光板,其复杂或许更加难以表述,但我们仍然期待它的热烈与温暖。

## 《收获》:“悲悯”与“初心”

□严迎春

《收获》2015年共发表了九部中篇小说:陈河的《爷爷有条魔幻船?》,鲁敏的《三人足》,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悟空的《初心》,阿来的《蘑菇圈》,荆歌的《珠光宝气》,尹学芸的《士别十年》,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王璞的《再见胡美丽》(不计入第五期的青年作家专号)。

对历史和过往时光的审视,是《收获》2015年中篇的一个突出主题。这些对历史的审视,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对那个年代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呈现,似乎是2015年《收获》中篇小说的一个集中追求。《蘑菇圈》和《再见胡美丽》是对那个时代的正面展示。因为是正面展示,里面有些桥段,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已经不觉得好奇。饥饿、自杀、背叛、发疯,已经形成了读者对那个时代的刻板印象,要在历史的幽深处,再打捞点什么,文学的任务其实很艰巨。《蘑菇圈》里,机村的工作组来了又走,反复变化。在政治风云如此激荡的时刻,谁的心里还有个生生不息的蘑菇圈?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天赐的自然,在某一刻,甚至对抗住了人造的政治。《再见胡美丽》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美丽及她的同学们——一群小知识分子生活的描绘。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小说里表现得很充分。小说以一种神秘的笔调,揭示的是一个并不神秘的事实:人并不是白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之所以被赞美,是因为很难做到。大部分人在那个时代里,即使手中无血,也很可能脚上有泥。

《平原上的摩西》和《爷爷有条魔幻船?》对历史的展示,是侧面进攻。《爷爷有条魔幻船?》是一部家族史式的中篇。中国人虽然热衷于修谱,但大部分族谱是说明文,后世子孙如想从中窥探到家族的奥秘几无可能。因此主人公阿冰如同大部分“70后”一样,对自己曾朝夕相伴的父亲并不了解,即使略微了解,也并不打算真正懂得。而对曾陪伴过童年岁月的爷爷,则是一无所知。他所了解的爷爷和上海姑姑眼中的爷爷,完全是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变故使曾拥有一条船的爷爷变成一个穷酸的爷爷?在时代的汪洋里,消逝的又何只是一条船?虽然有问号,《爷爷有条魔幻船?》里却并没有拷问的严厉,倒是有了一种货真价实面对记忆黑洞的惘然。只见过退潮以后裸露海滩的人,很难想象涨潮时的狂风巨浪,虽然我们曾在书里见过相关描绘,浮上心头的第一个疑问,仍然是“这是真的吗?”《爷爷有条魔幻船?》写出了这种微妙的感受。《平原上的摩西》集中了很多好看故事的元素,连环杀人案、少年时代的感情和承诺、下岗工人失业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风云。整个故事有一种压抑认命的基调,似乎无论怎么挣扎,人仍然是时代的牵线木偶,悲剧必然发生。所以作者变幻多个叙述视角,叙述语气却完全不变,始终是站在高处向下看的悲悯语气。

以上这四个故事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故事一直发展到了当代,历史与今天有对话。其中《蘑菇圈》最让人警醒,曾打败过政治的蘑菇圈,居然打不过资本。当蘑菇圈这种原始的神秘的生命力最后被摄像镜头完全监控,成为资本圈钱的符号,它让人不由得想起时下最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所有一切美好的、神秘的东西,人也罢,蘑菇圈也罢,在资本的魔棒下,都变成了商品,失掉了最后的尊严,让人痛惜。

如果说以上四篇小说是对时代的审视,那么《初心》《士别十年》里更多的是对过往时光的回顾。“初心”是2015年文艺界的一个热词,“不忘初心”的说法,由于文艺而又被言说太多,甚至有一种近乎讽刺的意味。需要经常被提醒的初心,让人怀疑它存在的有无和存在的意义。《初心》其实是一个标准的“门不当户不对”造成的悲剧,故事的核没有太多让人击节赞叹的地方——青年时由于外貌的吸引而相恋,暮年时由于性格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而分手,这更像是在婚恋指南提供有说服力的范本。这个故事吸引人的地方是一些由此衍生出的细节,特别是对布依族家族生活的描绘,大家庭里人与人相处时的尴尬和有情,像一个时代的活化石。《士别十年》的主题其实还是“初心”,对丢失“初心”原因的寻找。这种寻找里固然有一些自我反省的意味,但是作者更多归因于小县城官场生存环境的恶劣。最初的主人公郭缨子其实早已被杀死,留下的是行尸走肉的郭缨子,行尸走肉的郭缨子甚至还要极力证明死去的郭缨子毫无意义,就像我们对许多事物的态度一样,得不到它,就要证明它根本是坏的,或者是幼稚的。

《珠光宝气》《西北偏北之二三》《三人足》这三篇没有了历史和时光沉重的气息,全是对当下中产和小资生活的描绘。《珠光宝气》里,似真似假的珠子,似真似假的感情,而且似乎这样混下去也很不错。但生活毕竟是真的,当绕不过去的真来到的这一刻,主人公选择转过身,背向它。《西北偏北之二三》像是一篇在路上的小说,主人公赖最峰带着一身迷惘和浓浓的文艺小资的气息去了西北,最后带回一个趔趄。像一切虚弱的文艺青年一样,赖最峰总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小说中没有解释,他那么喜爱春河,却为何没有追求她,在她失踪后去芳踪所在地游历一番,更像是一种凭吊,不是寻找。凭吊的也更像是自己。这是一个开放的故事,有无限可能。《三人足》揭露的是时尚、现代、靓丽外衣下的危险,像毒蘑菇一样,外表越是艳丽的,越有毒。

随着新媒体的强势介入,中国当下的文学版图正经历着一场新的碰撞、整合。不可否认的是,在纯文学领域,传统的期刊写作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因此考察期刊写作是辨识中国文学脉络、把握当下文学动态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中国的小说写作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一方面是写作数量的激增,以长篇为例,2015年全年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300余部;另一方面是现实主义旗帜的高扬。当下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转型成为社会各层面的共同背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精神、物质、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新体验、新感受,传达这些新的体验、感受成为现实主义写作的原动力。

在2015年《小说选刊》所选的篇目中,有一类小说将笔触深入到高校的象牙塔内,以博士、讲师、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为关注的对象,探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传达作家们对知识、学术和智识阶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定位和价值问题的思考。因为这类小说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我们不妨暂且将其定义为学院小说或者知识分子小说,以区别于当下常见的乡土小说、打工者小说、市井小说等小说类型。这类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将知识或知识分子置于弱势地位和尴尬境地,意在凸显物质欲望、社会偏见对知识分子理性和人格的冲击和压迫,以及知识分子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

自然,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价值实现的多元化是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对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定位,和曾经“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智识阶层,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似乎成为价值实现的唯一标准。在此背景下,知识阶层被迫重新审视自身和学术的价值,在理想和现实、坚守与无奈中产生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这类小说的作者大多具有高校学习或工作的经历,相对了解高校生态,受高校高层次知识氛围的熏陶,或有过大量经典文本阅读的体验,因此小说的语言相对典雅考究,有书卷气息,有学院情调。

陈启文的《短暂的远航》以知识分子的命运映照现实,同时也完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映照,呈现了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窘境。小说的主人公黄忠会是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为完成导师高先生的学术夙愿,被迫放弃原则以换取商人傅雷鸣的经费支持。在一步步妥协中,师生二人精心筹划的学术研讨会竟沦为庆祝傅雷鸣旅游区开业的学术道场。一向仰慕他的师妹杨芝也臣服于傅雷鸣的财气魄力终于嫁作商人妇。讽刺的是,商人傅雷鸣曾经是黄忠会帮助过的拾荒者。黄忠会的尴尬既在于其赖以安身立命的学术的苍白无力,也是一个男人人格尊严的落败。姬中宪的《双人舞》延续了《短暂的远航》的主题,继续探讨价值实现的标准问题。小说的情节设计极为精巧,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让一个知识分子“我”与一个商人“你”相遇,并展开激烈的言语交锋。小说采用第二人称视角,以二人对话构成小说的情节。“我”是一名大学社会学专业的讲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优势在对方看来就是“很会说”。而商人认为成功的标准就是创造财富,是让教授为自己打工。二人的对话从一开始的闲聊变成一场针锋相对的价值观之争。小说具有荒诞意味,一个同车的小女孩竟将二人视作双胞胎,作者的深长意味在于,二人的价值观之争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价值选择的困境和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以上两篇小说处理的是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是学院象牙塔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冲突,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状态,在市场经济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当下具有十分典型的社会意义。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小说专注于探讨知识分子人性中固有的弱点,揭示他们灵与肉的冲突。这类小说往往以学院或高校生态为故事背景,在高校人际往来中深入挖掘知识分子人性中的不足。刘敏的《太阳风》塑造了在灵与肉、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徘徊不定的大学名教授梁兆华的形象。梁兆华素来以正直、时刻提醒自己与女学生保持距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观之俨然的君子居然有过一次婚外恋情和一个私生子。当私生子与他见面时,他一方面抑制不住爱怜之情,另一方面又担心要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当得知婚外情人已经去世,而私生子只是来见他最后一面时,梁兆华为自己的懦弱与自私深深羞愧和自责。孙频的《丑闻》以女博士的标签界定了这篇小说的题材类型。女主人公张月如是博士、大学讲师,在看似莫名的情况下先后与院长李文涛、酒店小老板周小华发生关系,又在感情失落、自暴自弃中成了杀人犯。其实,与其说造成张月如悲剧的是博士身份带给她的自卑又自得的矛盾心态,不如说是她爱慕虚荣的性格造成的对自我认知的模糊。换言之,小说的结尾张月如对自己博士身份的反复自我暗示是表,对自己被他人认可的渴望才是里,张月如的博士身份与她的悲剧并无必然的关联。小说对主人公身份的过度强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表现力。

以上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小说分别在两种维度上代表了该类小说的创作取向。应该说,知识分子小说的写作与当下文学写作者身份的日益专业化、学者化相关,我们期待看到内涵更加丰富、挖掘更加深入的作品。

□张俊平